

从开国斗到亡国

明朝残酷权力斗争全史

从没有哪个朝代，斗得像明朝那么久、那么狠、那么花样百出！

宗承灏 著



文匯出版社



从开国斗到亡国

明朝残酷权力斗争全史

从没有哪个朝代，斗得像明朝那么久、那么狠、那么花样百出！

张其成 著



文匯出版社



推荐序 历史要让人性复活

（岳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台湾清华大学前驻校作家，著有《南渡北归》《从蔡元培到胡适》等畅销书。）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元朝末年，有那么多豪门贵族、英雄豪杰蜂拥而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会是要饭出身的朱元璋。有人说，中国历史是个两段论：“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得天下者得民心”。前者告诉当事人如何去实现“得天下”的理想，后者是说得了天下其他都不是问题，包括民心。

有人会问，当皇帝，到底需要干什么？

或许朱元璋会告诉你，前半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后半程是“得天下者得民心”。更何况没有人比朱元璋更懂“民心”究竟为何物，很多时候，他就是“民心”的代言人。

如果朱元璋没有底层社会的生活经验，没有突破人生底线的黑心和辣手，那么朱元璋就不是朱元璋。

从字里行间，我能够感受得到，宗承灏始终处于一种“端着”写作的状态，不够放松，或许这源于他本人的性格。也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不喜欢拿历史随便开玩笑的人。对宗承灏选择这样一种写作态度，我还是持肯定的看法。我始终认为，一个连本民族历史都谈不上尊重的人，还能指望他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所馈赠吗？

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泡在泛黄的古籍堆里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会被一些看上去极其简单的问题深深困扰。比如说，会在文思泉涌的某个时刻突然停下来，向精神层面的另一个自己发问：“什么是历史？你写的这些东西是真相吗？”

另一个自己就会反诘：“你生活于当下，连当下的万象百态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凭什么去向一个容易遗忘的族群、一群容易遗忘的人索取过往的真相？”

往事并不如烟，对于一个历史书写者来说，真相绝对不是我们书写的真正目的，人性才是。也就是说，历史并非单纯的始于事，止于事。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将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做标本研究，未必能深入地了解那些人那些事。倒不如将他们置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围绕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盲点也许就容易被衬托出来了。博尔赫斯说：“我们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是我们永远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原因。”时间是拨弄人性的那只手，人性是吐纳时间碎片的机器。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往事，是一群人又一群人的集体往事，而在这往事的经纬度上曾经寄生过数以亿计的血肉灵魂。对于我们这些历史书写者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已经消失的时间能够重现于眼前，就是所谓的历史“复活”。过去了的东西当然不可能重来，更不可能搬进实验室进行解剖后再去做防腐处理。所谓的历史“复活”，不过是历史与现实在某程度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度，而这种相似又不是完全的契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是可以复活的。历史就是时间轴上的一个又一个点，是一段又一段的往事，它是有生命力的。所谓的消失，只是时间层面上的消失。作为一个历史文本的写作者而言，他的使命就是带领自己的读者去实现那段历史的复活。

心理学有一个神秘的词语——“神入”。而这个“神入”就成了宗承灏试图复活历史的路径。何为“神入”？神入者，它的简单化的同义词是“换位思考”。其实它不仅限于思考，更是我们感受他人内心体验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让你置身于历史发展的环境中去观察历史，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情感、理想、信仰和意图等，并理解历史事件的演绎变化。通过这种“主体进入客体之中去想象客体”的研究活动感悟历史，让“历史”得以“死去活来”。

如果用一句话来推荐宗承灏的这本书，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写给爱思考的人读的书，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书。

第一章 寻根辨踪之旅

第一节 身份与活路

1.大元王朝的失格

这个时代，因为后来的改朝换代，被史家们定义为元朝末年。

生在一个王朝末年，死亡或重生，皆有可能。当年，成吉思汗征服中原，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提议：杀光那些毫无用处的中原人，使广袤的土地变成丰美的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亏得那位有着海洋般广阔胸怀的大汗没有完全听从，他有着更为远大的梦想，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他的继任者忽必烈则用横扫欧亚大陆的骄人战绩，回应了他的目光，并将一个游牧部落打造的帝国推至巅峰。

自建立以来，元朝始终处于动荡状态中，或者说是“战争状态”。公元1260年忽必烈击败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自称大可汗之后，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完全归服于他。正因为如此，所谓的蒙古大帝国是不完整的。元朝建立后，它的势力范围也仅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这个专为战争而生的王朝，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仍没完没了地进行着。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使得后来的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

版图茫茫，局部战争不过是巨人伤了根手指头，并不耽误一个人的享乐，更不会一朝夺命。但战争打的是钱和粮，连年征战，小恙酿成大疾只是时间问题。仅1280年元朝统一中国后，有记录的战争就多达230场，如果再算上之前的，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很难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于是，汉人沦为三等公民，中华大地陷入千古未遇之奇灾剧变。

蒙古铁骑卷起的千里烟尘尚未散尽，持续了近百年的疾风骤雨悄然停息，而大元帝国却以惊人的速度滑向它的地狱之门。“长生天”赐予的福分，被他的子民们糟践得所剩无几。气息奄奄的老骆驼，就这样进入

它生命的倒计时。压垮它的，不是一根稻草，而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上层社会风气奢靡，道德瓦解，正所谓上流社会做着下流之事。而在社会的底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难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

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不能在马上治理？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元朝的制度时说，有史以来，以元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他认为蒙古帝国的执政者对于制度的漠视，从《元史·兵志》可知，“止有金军、补军、调军、遣军之法，别无养军、练军之法”，“其他刑罚、食货等，一切苟简”。元朝的执政者与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他们在相当长时间里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在他们看来，那些古老的智慧毫无用处。在嗜血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生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在明朝人修的《元史》中，对元朝灭亡的原因有这么一句总结：“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的衣着发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衙署将其全部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昊天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忍不住笑出声来，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你且忍耐忍耐，终有一天会改回去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大到每个国家，小到每个人，都被框定在层层边界之中，即我们所

生存的空间。对于元朝来说，他们的先人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形成了一种天然“边界”。而当他们骑上战马，身体的欲望被战马的奔跑带往永无止境的前方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边界意识，更失去了对于边界的管控能力。史书记载，统一后的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执政者的边界从来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依赖于支持这一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都是元朝所缺乏的。

蒙古人的边界意识来自他们的移动能力，以及本民族的神话、宗教信仰。神话将本群体的英雄神圣化，也将边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让人们不敢暴露在本族之神守护的边界之外。而边界的划分，使得元朝将全国人口不分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划分。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这样的划分带来的恶果很快显现，当处于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远在西域的二等“色目人”即使有立场，也可以忽略不计；而三等“汉人”，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倒向任何一方。如此一来，“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对峙，就形成了一对一的单挑之势。蒙古族骑士虽然勇猛无比，但人口数量过于稀少，尤其与其治下的庞大人口基数相比。区区百万人口撒在广袤的大地，即使加上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开不出绚烂的花朵。他们征服的世界过于庞大，凭借着卓越的移动能力，恨不得将战线一直推到天边，累死马，也累死人。不管他们多么凶猛，那种被汪洋大海淹没的感觉也让人恐慌。在潮水般的切割和包围中，他们丧失了最初的勇猛。

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含的力量是令元朝政府始料不及的。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元朝从一开始就犯了致命的错误，它将人口最庞大的群体定义为“四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起最具潜力的对手。

蒙古人与汉人、南人的矛盾是边界意识的现实镜像，正因为如此，元朝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传统史家所言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便是蒙古人和其他等级人种的矛盾。“地主阶级”曾是元朝政府有意拉拢

的对象，但由于部分“小地主阶级”可能是“汉人”或“南人”，这部分地主阶层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很容易就走到元朝政权的对立面。而许多手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在等级歧视和压迫过程中逐渐加入反抗者的行列。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农民义军就成了一支融合各社会阶层智慧的队伍。

如果社会矛盾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事件的发生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撒旦打开炼狱之门，人间沦陷。数万，甚至数十万平方千米的人间大地立时化作汪洋泽国。元至正四年（1344年），河南淮北地区连着下了二十多天的暴雨，致使黄河水暴涨，白茅堤、金堤等黄河堤坝决口。济宁、定陶、巨野等地水灾泛滥，人民苦不堪言。这次治河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开始。由于工程量浩大，朝廷征调了汴梁、大名以及庐州等地十七万军民负责工程的具体修建工作。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不幸的是，他们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

果然，如史料记载，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治河工地上“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广大在工地的贫苦民工都渴望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一个怪异发现。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的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利用谰语的效应鼓动民众造反这种计谋，数百年屡试不爽，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历史是周而复始的转圈游戏，城头变幻大王旗。在人心浮动之际，这种不具有原创精神的游戏所带来的功效是那些堂皇说教的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动。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市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他们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大造声势，并暗暗地鑿了一个石人埋于黄陵冈的当路处；同时精心策划，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很快就闻风而动。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每个改旗易帜的时代，都会迎来一场令人疯狂的盛宴。

2.王的身分与活路

一个人的身分注定了他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处。后人试图给朱元璋贴上各种身分标签：佃农、游民、和尚、造反者，或者是一个手段过于狠辣的帝王。他的一生至少有五次的身分转换经历，而每一次身分的转换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个人价值的自我提升与精神蜕变。有人说做了帝王的朱元璋，和作为小农的朱元璋，是两个人。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变，却又什么都变了。

这个古老的国度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盒子，每个人都活在其间。若是不满的情绪越积越浓，整个盒子里便会充斥着一种如弦在绷的紧张气息。烈火四野蔓延，各种改朝换代的传说应运而生。朱元璋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朱五四和他的祖父朱初一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一辈子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捞到。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是野草的种子散落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今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的祖父时期，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当时的老百姓都被编进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不同户籍承担着不同的供纳和劳役。这种强制性的供纳，与劳役者的身分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国库里面缺什么，生活于低层的劳力者就要无条件地供纳。

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意味着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句容县从来就不是一个黄金出产地，而作为赤贫户的朱初一，估计这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用说让他去淘金。在不讲理的世道里，生存者没得选择。可怜的朱初一只有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朱家本就是贫家小户，怎能禁得起这般折腾，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万般无奈之下，朱初一只好领着全家人候鸟似的四处迁徙。想尽办法，只为活下去，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包括人类。从这个层面上说，人类与蝼蚁并无差异。朱初一经历了怎样的困境，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将全家搬迁至洪泽湖南岸的盱眙。这里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他们停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在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就是活命之资。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生活的资格。能够活下去，已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宠。

朱五四搬到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他的小儿子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1328年的农历九月十八日是一个何等神奇的日子。史家不惜笔墨，将所谓的祥兆记录下来。那天夜里，朱家的屋顶上一片红光，左邻右舍以为失火，纷纷跑出来救火。朱元璋出生后，母亲抱着他到河里洗浴，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幃为他裹身。人们口口相传“真龙天子”降生时的种种神奇与灵异，而现实却是另一种情景。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年过半百，算是老来再得子。朱元璋的降临，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任何迹象，不过是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一份负担。朱元璋投生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胎里一落地，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饥饿、寒冷、肮脏、混乱的世界。哥哥、姐姐站在母亲旁边，用他们饥肠辘辘的肚子欢迎他这个家庭新成员的到来。

朱元璋的大伯朱五一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堂兄弟。他们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父亲朱五四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哥哥重四、重六、重七。因为朱元璋在这个家族中排行第八，所以取名“重八”。他还有两个姐姐，她们是没有资格排序的。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后来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里或多或少暗含着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对于乱世底层人群来说，孩子，不止于孩子。他也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命运轮盘赌中的筹码。所以，中国民间才会有“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

官府的敲诈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朱家也不例外。穷家破业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从开国斗到亡国》宗承灏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819.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